



全国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材

先秦两汉文导读

韩兆琦 熊宪光 阮忠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全国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材

先秦两汉文导读

Xianqin Lianghanwen Daodu

韩兆琦 熊宪光 阮 忠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内容简介

本书在教育部组织编写的“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本科”教材基础上新编而成,作为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材。相比较原书,本书将“先秦两汉散文”的概念扩大为“先秦两汉文”,加入了辞赋的内容,以更有利于学生掌握先秦、两汉文的发展全貌。全书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基础上,系统分析、论述了先秦、两汉文的发展、演进过程,介绍了先秦、两汉时期的重要作家与其代表作品,有史有论,史论结合,可帮助在校深化已学中国古代文学知识。

本书与《先秦两汉文选》配套使用。除供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专科师生使用外,也可供高等院校开设文化素养课及文学爱好者学习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两汉文导读/韩兆琦,熊宪光,阮忠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2
ISBN 978-7-04-038958-6

I. ①先… II. ①韩…②熊…③阮…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先秦时代-高等学校-教材②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汉代-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7696 号

策划编辑	肖冬民	责任编辑	肖冬民	封面设计	张雨薇
版式设计	杜微言	责任校对	杨凤玲	责任印制	张泽业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200 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racom.com>
<http://www.landracom.com.cn>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5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38958-00

前言

2002年春,受教育部委托,我们组织编写了供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本科使用的《先秦两汉散文专题》与《先秦两汉散文专题作品选》。两本教材自2002年7月出版以来,不仅供广大中学教师学历提升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使用,而且有不少全日制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也在使用。在此谨向使用过该两本教材的教师与学生表示深深的谢意。

光阴荏苒,到今天这两本教材已经发行了11年,而我国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本科的任务也已经基本完成,大多数中学教师都已经具有本科学历。为此,高等教育出版社同我商量,希望随着形势的变化,重邀作者,编写两本新的教材,既参照过去的基础,又在内容和体例上呈现一些较大的不同,给人一种新鲜感。经过协商,最后确定两本新的教材一本叫《先秦两汉文导读》,一本叫《先秦两汉文选》,供作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用。

新编的《先秦两汉文导读》,与原来的《先秦两汉散文专题》比较,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变化:首先是对于“散文”概念的理解有所不同,《先秦两汉散文专题》所讲的“散文”中不包括“辞赋”;本教材则将“辞赋”包含进来,特设了“两汉辞赋”一章。但考虑到当前高等院校文学史教学的实际情况,“两汉辞赋”仍以讲历史、讲知识为主。其次是在东汉叙事写人的文章中特别讲到了《东观汉记》,这是很有开创性的。同时还讲到了新登文学舞台的碑铭文学。再次是本教材将原有的历史散文三章、诸子散文三章,根据内容结构,都调整成了四章。最后是将两汉论说文的两章合并成一章。

本教材开头有一篇比较详尽的“绪论”,讲述了先秦两汉的时代背景与各个时期相对应的文学现象,希望对中国通史与中国文学史不太熟悉的学生能够仔细地读一遍,并记住其大体脉络。本教材在先秦部分的最后有个“先秦文小结”,在两汉部分的最后有个“两汉文总体回顾”,希望讲课的教师与学习本课程的学生能认真体会一下其中所提出的问题,有利于对这门课程的总体认识和对所学知识的融会贯通。

本教材的作者是韩兆琦(北京师范大学)、熊宪光(西南大学)、阮忠(海南师范大学)。韩兆琦负责全书的《绪论》与两汉辞赋、《史记》、《汉书》等,共7万多字;熊宪光负责先秦的全部,共7万多字;阮忠负责两汉论说文,共3万多字。

本教材与《先秦两汉文选》配套使用;所涉及的知识范围较《先秦两汉散文

专题》有所扩大,但总体的难易程度仍不相上下。欢迎使用本教材的教师和学生提出宝贵意见。

韩兆琦

2013.12.31

目 录

绪论——先秦两汉文的时代背景与发展概貌	1
---------------------------	---

上编 先秦文

第一章 《尚书》《逸周书》	10
第一节 《尚书》	10
第二节 《逸周书》	12
第二章 《春秋》《国语》	15
第一节 《春秋》	15
第二节 《国语》	20
第三章 《左传》	25
第一节 《左传》的作者、成书时代与体例	25
第二节 《左传》的民本思想	26
第三节 《左传》的文学成就	29
第四章 《战国策》	33
第一节 《战国策》的性质与成书过程	33
第二节 《战国策》的思想内容	34
第三节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36
第五章 儒家之文	43
第一节 《论语》	43
第二节 《孟子》的思想内容	46
第三节 《孟子》的散文艺术	49
第四节 《荀子》	51
第六章 道家之文	55
第一节 《老子》	55
第二节 《庄子》的思想内容	58
第三节 《庄子》的艺术成就	60
第七章 墨家、法家之文	64
第一节 《墨子》	64
第二节 《韩非子》	66
第八章 杂家之文及其他	70
第一节 《吕氏春秋》	70
第二节 《晏子春秋》及其他	73

先秦文小结	80
-------------	----

下编 两 汉 文

第一章 两汉辞赋	83
第一节 两汉辞赋概说	83
第二节 枚乘与司马相如	87
第三节 扬雄、班固与张衡	92
第二章 两汉论说文	97
第一节 贾谊、晁错等的论说文	97
第二节 刘安、司马相如等的论说文	104
第三节 刘向、扬雄的论说文	113
第四节 王充、王符的论说专著	116
第五节 马援、班超、张衡等的论说文	121
第六节 孔融、陈琳、曹操等的论说文	126
第三章 司马迁与《史记》	130
第一节 司马迁的家世与生平	130
第二节 《史记》的思想内容	133
第三节 《史记》的艺术成就	141
第四节 《史记》对后世的影响	149
第四章 《汉书》《东观汉记》及其他东汉叙事文	152
第一节 班固的生平与《汉书》	152
第二节 《汉书》的思想内容	154
第三节 《汉书》的艺术成就	159
第四节 《东观汉记》《吴越春秋》及其他东汉叙事文	162
两汉文总体回顾	170

——先秦两汉文的时代背景 与发展概貌

所谓“先秦”，即秦朝建立之前，通常指自“开天辟地”以来直到秦始皇的统一。它包括了传说中的实际为原始社会的所谓“三皇”“五帝”时代，实际为奴隶社会的夏、商与西周时代，奴隶制开始崩溃的春秋时代，封建制已基本确立而各诸侯国正处于互相兼并的战国时代，一直到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秦王朝建立为止。又由于秦王朝存在的时间很短，而秦王朝的“文学”又只有丞相李斯一人的几篇文章，就是这几篇文章还有的是写在秦王朝的统一之前，所以我们便把秦代的这点“文学”一并放在先秦时期里讲了，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原始社会所经历的时间可能很长，当时又没有文字，所以那时的社会状况以及人们的生活、思想我们都无从得知。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只是一些文字产生以后人们根据古代传说再加以丰富想象所作的一些描摹，如《韩非子》曾说过的“构木为巢”“钻燧取火”等。后代人类科学家对一些未开化地区人们的生活所进行的研究，证明韩非所作的这些描摹还是很可信的。那时的“文学”只有通过口头流传下来的一些歌谣和神话传说，它们被简单地有些甚至是无意识地记载在后人的著作里。

奴隶社会大约从夏朝初年开始，其政治标志就是大禹通过“禅让”所得来的帝王之位，到他临死时不再“禅让”，他把他的王位传给了他的儿子启，从此在中国历史上开始了“家天下”的局面，这大约是在公元前 21 世纪。中国古代文字的发明与使用大约就在夏朝，但由于开始不成体系，再由于资料保存的困难，所以夏朝的灭亡与商朝的建立也仍是通过口头传说流传下来的。商朝的建立大约是在公元前 16 世纪，这时的奴隶社会已经有了更程度的发展，其生产规模与物质文明的建设也比夏朝有了相当大的提高，中国古代的文字到这时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这是从后代出土的钟鼎文与甲骨文上可以得到证明的。商朝人的生产、生活以及当时人们的思想、风俗，我们也可以从保

留下来的甲骨卜辞上看出某些信息。商朝的文献保留到今天篇幅最长的无疑是《尚书》里的《盘庚》三篇，它记载了商朝中期的帝王盘庚说服并带领他的臣民由今河南温县迁都到今河南安阳一带的“殷”地的情景。有关商朝末期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周朝人的文献中看到一些。

周朝人灭商是在公元前 11 世纪，奴隶社会到这时已经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周朝人的生产水平与经济实力是商朝人无法比拟的，周朝人在上层建筑方面所进行的开创更是商朝人所无法企及的。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孔子在《论语》中也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大概就是指此而言。西周初期的文献资料保留到今天的就很多了，诸如《诗经》中的一部分《周颂》和《大雅》，《尚书》中的《牧誓》《大诰》《无逸》等十多篇，以及《周易》中的许多爻辞等。长期以来人们总把周朝初年许多典章制度、文化措施的创立和周公联系起来，甚至说它们的许多篇章、许多条文都是周公制订的，于是周公遂成了我国古代文化领域里的第一个大圣人。这里面虽有夸张演义，但也反映了相当程度的现实。

西周在政治上实行一套森严的等级制度，在奴隶主阶级里周天子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一切土地都属他所有，一切人都是他的臣民。《礼记·坊记》里有所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诗经·北山》里有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周天子对国家的管理办法是实行分封制，他自己直接管理一片最大的领土，其他地区则按照被封者的级别高低分成大小不等的许多块，以封给他们的子孙和帮着他们一道灭商的功臣，这些叫作诸侯国。天子手下的第一级大臣称作卿，卿的地位和诸侯国里的诸侯地位相当；依此类推，于是诸侯国里的第一级大臣就只能相当于天子那里的大夫了。各诸侯国对周天子必须绝对服从，必须奉行周天子所规定的各项制度，按时按规定地给周天子进贡，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如果哪个诸侯国得罪了周天子，周天子对他实行讨伐时，按规定那个国家的诸侯是不能反抗的，这就是所说的“有征无战”。这些都是为了调整奴隶主阶级内部的关系而言的，至于他们对奴隶阶级的压榨，那是非常残酷的。以“仁慈”著称的周文王就明确地下过“有亡，荒阅”的命令，也就是说，对于逃跑的奴隶，必须实行大搜捕，直到把他们捉回来，予以严惩为止。

西周时代的文章，今天所能见到的是《尚书》《逸周书》与《国语》里的一些篇章，这些作品的作者都是奴隶主阶级的人物；作品的内容也都是写的奴隶主，甚至大都是与奴隶主最高集团有关的事情：它们或者是歌颂某个祖先，或者是歌颂某个帝王，或者是某个有身份、有远见的大臣告诫某个年少的

帝王，等等。这些作品由于年代久远，所以文字都比较难读；但非常宝贵，因为它们是为后代可以真正拿出来讲的我国最早的文章。

西周后期统治集团的残暴腐朽和当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尖锐情况可以从《国语》的一些篇章中看到。西周政权终于在公元前 771 年被它西邻的“犬戎”民族灭掉了；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将周王朝的国都由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南的镐京向东迁移到了今河南省的洛阳市，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东周王朝的开始。

从公元前 770 年到公元前 475 年，这段东周王朝的前期，人们通常称之为春秋时代，这是因为后来被儒家定为经典的那本名叫《春秋》的历史纲要正好大体是写的这段时间。春秋时代是一个奴隶制日趋崩溃，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逐步发展成长的时代。《左传》宣公十五年（前 594）鲁国实行“初税亩”，昭公四年（前 538）郑国实行“丘赋”等，就是从经济方面流露出来的这方面的信息。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奴隶主阶级的金字塔在从上到下逐层倒塌。春秋初期首先表现出来的是周天子王权的下落，他为了取得诸侯的信任，竟至于需要和诸侯交换“质子”；当他出兵讨伐使他无法忍受的诸侯时，诸侯们也敢于和他对抗了，甚至还有人竟狠狠地射了他一箭。“有征无战”的时代过去了，昔日的制度再也没有人乐意遵守，周天子直辖的地盘越来越小，内忧外患，以至于周天子连自己的安全都无法保障，都得乞求于大国诸侯的维护。而各个诸侯国之间则展开了激烈的兼并战争，强凌弱，众暴寡，杀伐不绝，整个华夏地区的形势，决定于几个实力强大的诸侯，这就是所谓的“霸主”；这时的周天子也只能俯首帖耳，听从他们召唤。这是春秋中期的情景。至春秋后期，各诸侯国里的诸侯又成了傀儡，而决定一切、指挥一切的是各个国家里的大夫，如晋国的六卿、鲁国的三桓、齐国的田氏等。过去在西周时代用以协调奴隶主阶级内部关系的种种道德礼法，到这时统统不起作用了，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君臣之间篡夺不已，杀伐不休。这就是孔子所深深慨叹的“礼崩乐坏”，司马迁《史记》有所谓“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指的就是这种情形。应该注意的是，到春秋末期在各个诸侯国里控制政权的这些大夫们，基本上已经不再是奴隶主，而在更大的程度上已经变成为新兴的地主阶级了。

春秋时代的文章，保留到今天的主要有《尚书》里的某些作品，以及《国语》中的部分资料。与西周时代的作品比较起来，春秋时代的这些作品开始反映了下层贵族和一些劳动人民的生活；从作品表现出的思想倾向看，讲神、讲天命的内容相对减少，而讲德、讲民以及对黑暗政治、对腐朽奴隶主进行揭露、进行批判的内容逐渐多起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同时在文字上也比西周时代的作品略为浅近、略为好读了。

从公元前 475 年到公元前 221 年是东周的后期，人们通常称之为战国时

代。这时从生产关系上看，已经进入了封建社会；从政治形势上看，则正处于七个大的兼并战争中。战国初期比较强大的是魏国、齐国、楚国；秦国变法后，迅速强大起来，成为了秦、齐、楚三强并立的局面；接着秦国实行“远交近攻”，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到公元前221年，遂彻底消灭了东方六国，建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战国时代是一个大混战、大动乱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文化迅猛发展、高度繁荣，英雄辈出、人才辈出的时代。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士阶层兴起及其在社会各领域充分发挥作用。所谓“士”，原是指奴隶主阶级里的最下层的一部分人。但是到了春秋时代，随着奴隶制度的逐渐崩溃，这个阶层的力量越来越壮大了，有些原是奴隶主中、上层的人，后来可能由于破落而降为了“士”；也有些原是奴隶或庶民的人，后来可能由于某种原因而升为了“士”。到了春秋末期，这个阶层的人物就已经相当有影响了，例如孔子及其门徒就是这个阶层人物的杰出代表。到了战国时代，随着贵族垄断教育的被突破，私人教育的发展，这个阶层里掌握知识、掌握技能，从而使自己具备文武才能的人物也就越来越多了。其中有一类属于思想家类型，这是沿着春秋末期孔子的那条道路发展下来的，如老聃、墨翟、孟轲、庄周、荀况、韩非等。这些人都有自己的理想，都有自己治理社会的方针，他们原来也是想与统治者合作，想有所作为的，只是由于他们不被统治者所用，所以才只好自己关起门来著书立说。他们这些著作的性质，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用鲁迅的话说，就是为当时的统治者“开药方”。即使一时没人用，他们也是希望日后能够有人用。这些人一般说来都有自己坚定的信仰，他们到处奔走，推行自己的主张，但对当权者却从不低头。他们宁可“以身殉道”，而决不改变自己的原则去迎合当权者的需要。所以这些思想家们大都是到处碰壁，在贫穷困顿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另一类相当活跃的“士”人是纵横家。所谓“纵横家”，其实就是政治活动家。他们在当时的各个诸侯国之间穿梭往来，到处兜售他们的政治主张。他们的精神面貌各不相同，有的忠于某国，持论一贯，如张仪、陈轸；也有的没有固定的思想行为准则，他们所追求的就是有官做，而政治主张可以随时变化，如苏秦、苏代等就是如此。除了这些以讲“合从（纵）”、“连横”闻名的纵横家外，当时还有一批很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士”人出身，如吴起、乐毅、蔺相如等。

战国时代还有一批相当有影响的下层“士”人，他们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平时也从未引起过什么人的注意，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却见义勇为，做出了一些有声有色的令人感奋的举动，如鲁仲连、侯嬴、毛遂、荆轲等就是如此。

战国时代的“士”人，大都思想积极，勇于建功立业，希望把自己的文

武才干贡献给社会。他们敢想敢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对于不同学派的主张，他们敢于争辩，甚至彼此可以互相“攻击”，这就是历史上通常所说的“百家争鸣”。这对于思想文化的发展无疑是极其有利的。

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之所以能在那时出现，和当时那种比较宽松的政治局面密不可分。当时各国的统治者，和其他任何时期统治者的表现都不同，他们为了壮大自己，彼此都在互相竞争，延揽人才，礼贤下士。仅以当时“好客”闻名的统治者来说，就有燕国的燕昭王、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秦国的吕不韦等。当时齐国的稷下曾是一个群贤荟萃、各家各派都在那里设帐讲学的地方。统治者虚心下问，“士”人畅所欲言。听得投机就采纳、任用、实行；听着不合适，也无须怪罪，“士”人可以卷铺盖走路，明天再到别的地方去讲。谁也不必怕谁，谁也不必勉强谁，“士为知己者用”这个带有双向选择性质的行为准则就是在那种政治条件下产生的。也正因为如此，当时有一部分“士”人的“傲气”十足，他们决不甘心做统治者的臣子、部下，而是扬言要做“帝王友”，甚至要做“帝王师”。他们居然可以当着某国帝王的面，说一个活帝王的人头抵不上死“士”人坟头上的一把草，这都是当时那种特定政治条件下的特定产物。

战国时代的文学，从中原地区来说主要是散文，主要分为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两大类。历史散文有《国语》《左传》《战国策》；诸子散文有《论语》《墨子》《老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有些作品的标名，如《管子》《晏子春秋》《孙子兵法》，看来像是春秋时代的东西，其实也是战国时代的该学派的后人之所作。这些都是应用文，但因为它们大都非常讲究叙事和论辩的艺术，所以写得很有文采。尤其是其中的《左传》《战国策》《孟子》《庄子》四种，两千多年来一直被当作古代文章的典范。战国文章内容上的突出特点，其一是“重民”的思想大大增强了，从《尚书》到《国语》，再从《国语》到《左传》，可以清楚地看出其“民主”精神不断增强的轨迹。这种精神在《孟子》里达到了高峰。《孟子》里的许多观点在它以后整个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都显得十分卓绝，以至于到资产阶级酝酿民主革命时，有人还把它里面的许多东西当成一种精神武器。其二是作品主人公的身份、地位在不断下移，表现下层“士”人品质、才干的内容在逐步加强。这种轨迹突出地表现在由《尚书》到《国语》，到《左传》，再到《战国策》的演变过程中，在与《战国策》前后同时的诸子散文里对此也表现得十分明显。战国文章的通俗性比以前的文章又大有增强，在描述情节、描写场面，以及在描摹人物的口吻神情上，比起春秋以前的作品都有巨大的进步。战国时代的论辩文章风格泼辣，放言无忌，且又非常注意文章的生动形象，于是历史典故、寓言故事，信手拈来，滔滔不断。我们读的明明是应用文，但其文学性、艺术

性却是空前的，而且在它以后的两千年里，我们也很难读到如此精美的论辩文章了。

战国时代只有 200 多年，但它在思想、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比它以前的两千年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好。我们今天讲先秦文学，说起来像是时间跨度长得很，但实际上真正要讲的主要就是战国时代的東西。

秦朝于公元前 221 年吞并六国，统一天下，但由于它缺乏经验，它误以为只要靠严刑峻法，只要靠武力镇压，就可以保证其专制统治的长治久安，所以它焚书坑儒，实行愚民政策，结果只维持了不到 13 年，就被陈胜、吴广带头发动的农民起义推翻了。秦朝的失败给后起的汉王朝的统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历史经验，汉武帝之所以要“尊儒”，正是为了解决这种一面进行武力镇压，一面进行精神麻醉的问题。秦王朝的昙花一现，为汉王朝的长期统治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借鉴。

关于秦朝的文学，客观上由于它时间很短，再加主观上它又极不重视，所以正如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所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李斯的几篇文章见于《史记·李斯列传》；李斯跟随秦始皇到处巡游所作的一些歌功颂德的刻石的铭文，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

从公元前 206 年刘邦建国到公元 8 年王莽篡位，中经 214 年，因其建都于长安，历史上称之为西汉。王莽篡位后，不久即爆发了全国农民大起义，公元 25 年，光武帝刘秀夺取了政权，重建了汉帝国。从此一直到公元 220 年汉献帝被曹丕所篡代，中经 196 年，因其建都在洛阳，历史上称之为东汉。西汉、东汉，再加上中间王莽称帝的十几年，共 427 年，历史上所说的“两汉”就指这段时间。从两汉王朝的整个国力、整个文治武功来看，它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史上，是最强大的历史时期之一，它可以和唐代前期、清代前期鼎足而立。

两汉时期的思想文化直接继承了先秦的尤其是战国以来的传统，儒、墨、道、法、纵横、刑名、阴阳各家各派，在汉代初期都公开流行，对汉代社会都有深远的影响。汉武帝尊儒后，名义上是儒学一派独尊，实际上是以儒为名，其中融合了各家各派思想的一种“杂霸而治”。在两汉的整个 400 多年间，总体说来，汉代统治者的思想是相当宏放的，他们对古代、对国内各民族以及对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東西，只要是好的、对自己有用的，就能大胆地拿来，加以吸收、学习、利用。两汉时代的士大夫，一般都思想积极，关心国事，充满上进心，他们或者想为国家建功效力，或者想通过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以达到影响王朝政治、影响社会人生的目的。这些特点我们可以从贾谊、晁错、司马迁、王充、班固、张衡等代表人物身上看到。

两汉文学成就最高的是包括辞赋在内的广义的散文，它上继先秦，与战国时代的散文一道共同构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散文高峰。它和唐宋的诗歌、元代的戏剧、明清的小说，分别雄踞于各个时期的文坛。在汉代真正“为艺术而艺术”，并且又能风靡一时的是辞赋。这种文体直接继承了战国纵横家的辩术和屈原、宋玉的“楚辞”。它们在屈原、宋玉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变本加厉，越来越不重视思想，而一味在文字、在形式上下功夫，争奇斗艳。

从公元前206年刘邦建国，到汉景帝死（前141），中经66年，历史上一一般称之为西汉初期。这个时期汉王朝的任务是休养生息、积蓄力量，逐渐削平割据势力，逐渐加强中央集权。这个时期的文化领域，则表现为战国思想的回潮，统治者倡导黄老，实际是儒、墨、道、法各家各派的复苏。这个时期的文学主要是政论文与辞赋。政论文主要是结合当时的严重社会问题而发的，而辞赋则更多地是沿袭着屈原、宋玉的余绪，新的开创不多。只有枚乘写出他的《七发》时，才给辞赋开拓出了一种新局面。

从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到宣帝黄龙元年（前49），中经90余年，这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汉王朝对匈奴进行了自卫反击战争，解除了北部的边患。又对南越、东越、西南夷、朝鲜、大宛进行了一系列战争，扩大了版图、打通了与西域的国际交通。在思想文化领域，汉王朝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完成了思想统治的一整套制度。从好的方面说，这使得汉王朝更加统一、更加强大了；从不好的方面说，这些活动也给黎民百姓造成了许多牺牲流血、劳民伤财的苦难；在思想上完全取消了汉初那种自由活泼的生动局面，使人们的头脑逐渐禁锢在儒家思想教条的统治之中。在这个时期的文学中，散文与辞赋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时期的大散文家有司马迁、董仲舒、桓宽；大辞赋家有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等。尤其是司马迁的散文与司马相如的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更是高标独树，成为了各自领域里永世不可企及的典范。

自公元前48年汉宣帝死，汉元帝即位，到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政权，中经73年，人们称之为西汉后期。这时最有名的散文家是刘向，最有名的辞赋家是扬雄。西汉后期的散文，在风格上与西汉前期、西汉鼎盛期是大不相同的。前两个时期的散文，以朴拙豪迈、气势奔放、酣畅淋漓为特色、为主流，成为例外的只有一个董仲舒。董仲舒的文章温文尔雅，曲折细密，引经据典，并时而夹带着一种神学的恫吓。这既表现他的思想，又是他企图用以“胁制”君主、愚弄臣民、实现他以儒术治理天下的一种手段。董仲舒的思想和他的文章如果说在武帝时代还只是一种苗头，一个非主流的支派，那么到了西汉后期以至于东汉前期，就成为一种滔滔滚滚的时代潮流了。这时刘向、谷永、贡禹、鲍宣等人的文章都是这种样子。西汉后期的辞赋创作在数量上据记载不

少，但今天多已不存。就其代表作家扬雄的辞赋而论，一个最明显的特点是模拟性太强。他的主要作品是模仿司马相如，此外也有的是模拟屈原和宋玉。尽管扬雄有才华、有学问，能在模拟他人的过程中时而别出自己的新意，但总的看来效果仍很微弱，仍出不了多少前人的窠臼。

从公元 25 年汉光武刘秀建国到公元 105 年汉和帝死，这期间约 80 年，人称为东汉前期。东汉前期毫无疑问也是我国古代最强大的历史时期之一，这时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刚刚过去，东汉统治者为了缓和国内矛盾采取了许多办法，诸如解放奴婢，清查土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等，使经济迅速地得到了恢复与发展。这个时期的统治者很重视文化学术，尤其重视儒家的所谓“经学”。汉明帝曾多次亲临太学，给学生讲课；汉章帝曾亲自主持了白虎观会议，以讨论“五经”解释的异同。这个时期的“经学”是两汉四百年间兴盛的顶峰，许多著名的经学家如桓谭、贾逵、许慎等就都生活在这个时代。

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仍主要是散文和辞赋，而作为散文和辞赋的代表作家，二者集中于一人，这就是班固。班固的《汉书》是东汉最伟大的散文著作，两千年来一直与《史记》并称。但二者比较，《史记》则主观性更强，更像一部文学著作；而《汉书》则客观、严整，更像一部史书。所以对于后世历朝“正史”来说，《史记》虽有开创之功，但从规模写法上真正对后世影响大的乃是《汉书》。班固也是东汉杰出的辞赋家，他的《两都赋》结构宏伟，铺陈绚丽，在辞赋史上只有比他略晚的张衡的《二京赋》可以与之相媲美。东汉前期的散文家与辞赋家还有王充、桓谭、冯衍、崔实、赵晔、马第伯等。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这个时期的文学状况是：“及明章叠耀，崇爱儒术，肄礼璧堂，讲文虎观，孟坚珥笔于国史，贾逵给札于瑞颂，东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论，帝则藩仪，辉光相照矣！”

以班固为代表的东汉前期的文人士大夫，多数思想积极，歌颂皇权，有爱国心，有时代自豪感；他们重气节，讲究个人的行为操守，他们把儒家所提倡的那套伦理道德看得很重，甚至重得有点发迂，所以我们从他们的文章中一般读不到司马迁笔下所有的那种强烈的民主性与批判性。当时只有一位作家比较特殊，这就是王充。王充的出身地位比较低，自己深受当时豪门世族的压抑之苦。他对当时社会上所笼罩的那种虚伪荒唐的儒学与神学迷雾，非常痛恨，他之所以要写作《论衡》，就是为了揭穿、为了痛斥这些骗人的东西。《论衡》像是沉沉黑夜里的一盏明灯，像是长空里的一声惊雷，在当时起到一种振聋发聩的作用。

从公元 105 年汉和帝死汉安帝登基，到公元 220 年汉献帝被曹丕所篡，中经 110 多年，人称之为东汉后期。东汉后期思想文化上的特点，第一是维持汉代社会长达 200 多年的儒家思想统治逐渐崩溃，从此各种思想学说，各种行为

表现，各种在过去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现在都公开地流行起来。汉灵帝于公元 178 年建立了一个鸿都门学，“诏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课试”（《后汉书·灵帝纪》李贤注）。从今天的观点看来，这种做法实在具有为“艺术”争地位的进步意义，是对旧秩序的一种突破。马融是当时著名的大经学家，而他的生活情景却是：“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后汉书·马融传》）这说明儒家那些老教条、那些清规戒律的确是让人腻烦透了，连它们的那些基本队伍也不愿再奉行。第二是道家思想流行，追求超脱，追求隐逸，希望摆脱羁绊，过一种逍遥散荡的生活。也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当隐士、求神仙成为了一种时髦的行为。第三是喝酒放荡，及时行乐，过一天算一天，这是最典型的颓废没落，而在东汉末年，滔滔皆是也。这种情绪不仅表现在许多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中，也表现在许多文人的文章里。

这个时期的文学，比较突出的是抒情小赋的兴起，这些小赋或是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绝望；或是表现了作者对官场羁绊的厌恶和对田园生活的企慕之情；或是对自己身边事物、自己喜怒哀乐的描写与抒发。过去那种描写帝王宫殿，描写帝王田猎，描写他人的“壮举”，为他人歌功颂德的东西再也不见了，而作家们仿佛突然发现了“自己”，于是充满兴味地写起自己来。这个时期的诗歌、辞赋、散文，都非常清楚、非常具体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社会现实，也非常真实、非常袒露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文人士大夫们的思想面貌。

总之，东汉后期是一个无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在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是一个新思想、新风气逐渐兴起，旧传统、旧教条被怀疑、被打破、被蔑弃的时代，这种变化是随着年代的推移而与日俱增的，它标志着一个政治动乱而思想活跃，一个文学创作更加自觉的时代就要到来了。

《尚书》《逸周书》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其中保存有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它也是我国第一部兼记叙和论说的散文集，其文章已具有初步的艺术技巧和一定程度的形象性。但其文字古奥艰涩，语句拗口难读，体现了早期散文的风貌。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辨析古史之体，即首列“《尚书》家”。类属此家的先秦史籍，除《尚书》外，还有《逸周书》。

第一节 《尚书》

《尚书》原称《书》，“尚”通“上”，指“上古之书”；儒家列入“六经”，又称《书经》。《史通·六家》说：“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这就是说，其主要内容不外乎政府的文告、君王的誓命或贵族的诫词。

《汉书·艺文志》说：“《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此说流传颇广，但不足以凭信。其实，《尚书》大体是春秋以前历代史官所收藏的政府重要文件和政治论文的选编，究竟由何人于何时汇编而成，已难确考。孔子也许是“编次其事”者之一，但未必是最后的编定者。此书先秦时以多种形式广为流传，文字也不尽一致。汉代以来，《尚书》有今、古文之分。今文《尚书》是秦始皇焚书后由汉初经师故秦博士济南伏生所保存、传授，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有28篇；古文《尚书》则是汉武帝时陆续发现，用先秦“古文”书写。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16篇，但后来亡逸，仅存篇目，佚文散见于《汉书·律历志》等。至于今本《十三经注疏》所载《古文尚书》58篇，乃东晋梅赜所献。其中包括伏生本28篇（梅赜分为33篇），其所增25篇，经清儒阎若璩、惠栋等详加考辨，确证全属伪作。因此，现在研讨《尚书》，只限于今文